普陀山观音洞窟研究

志 道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浙江舟山

【摘要】本文以普陀山观音洞窟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法，探究其概况、历史文献、空间特征及石刻佛像。观音洞窟存有“三世佛”及“西方三圣”等石刻，虽因年代侵蚀与烟熏等缘故，依托“观音”命名成为圣地景观，与所属寺院形成空间互补，石窟造像亦为神圣性建构提供支撑。研究同时指出石窟文物保护薄弱问题，可为佛教文化遗产保护及同类信仰景观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观音洞窟；文献考析；石刻佛像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38

A study on the Guanyin Cave of Putuo Mountain

Dao Zhi

The China's Buddhist Academy of Mt. Putuo, Zhoushan, Zhejiang

【**Abstract**】Taking the Guanyin Cave of Putuo Mountain as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its general situati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context, spati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maining stone-carved Buddha statues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preserved Buddhist stone carvings including the Trikaya Buddhas and the Three Saints of the West in the Guanyin Cave. Although damaged by natural erosion, smoke fumigation and other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ver the years, the cave has formed a unique sacred Buddhist landscape based on Guanyin belief, and forms a favorable spatial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temples. The grotto statues also serve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ve's sanctit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spat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Guanyin Cave, and points out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weak foundation and imperfect system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work of the cave.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Buddhist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tor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grotto statues, and academic research on similar Buddhist belief landscapes.

【**Keywords**】Guanyin cave; Literature analysis; Stone-carved Buddha statues

前言

在东亚文化圈乃至全球范围内，观世音菩萨信仰均具有广泛影响力，而普陀山作为公认的驻锡道场，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共同构成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体系。从地理区位来看，该圣地行政隶属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是一座孤悬于东海海域的岛屿，因地处海岛之中的空间特质，素有“海天佛国”的美誉，同时也是国际观音菩萨信仰的朝礼中心。

普陀山不仅是我国首批获批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更在景观类型上具备显著性——它是国内首个且唯一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特色的海岛型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与日本僧人慧锷及“不肯去观音”的传奇故事存在紧密关联，该传说为普陀山观音道场地位的奠定提供了依据。在普陀山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御赐“宝陀观音寺”匾额起，普陀山的空间营造活动不局限于物理形态的构建，在自然环境特征、民间传说故事、宗教信仰习俗及相关仪式活动的多重作用下，逐步形成典型的圣地景观空间建构模式。

观音洞是普陀山众多著名景点中极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同时也是岛上为数不多的石窟景观之一。其所在的观音洞庵，同样是普陀山寺院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共同组成该区域的核心宗教景观单元。在普陀山景观神圣化的进程中，洞穴这一景观要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其展开专门讨论，能够有效拓宽佛教建筑与景观历史研究的视野。

本文以普陀山观音洞为研究对象，针对特定空间地点神圣性的来源机制、空间结构、洞内石像与认同形成过程展开研究。当前学界针对普陀山观音洞的专项研究仍相对薄弱，存在学术空白，但在建筑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中，关于普陀山的历史发展脉络与观音信仰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1 普陀山观音洞概况

观音洞坐落于普陀山西麓山腰的鹦哥石下方，其本体为自然形成的洞穴，相传是观音菩萨梵修之所。该区域当前景观呈现出鲜明的生态与人文交融特征：观音洞后方区域树木成荫、巨石层叠，在巨石之上镌刻有“大士重现”四个大字，经考证为1979年侨居美国的寿冶和尚到访普陀山时所题；林间甬道两侧植被茂密，观音洞所属的庵宇隐匿于林间，营造出幽静避世的空间意境，强化了宗教场所的肃穆氛围。回溯其原始形态，观音洞最初并无殿宇建筑，仅存有数株梅树，因此也曾被称作“古梅岑”[1]，该名称亦成为追溯其早期景观风貌的重要依据。

观音洞区域宗教功能的发轫可追溯至明代初期，彼时已有僧人于此构筑茅蓬以作修行之用。关于观音洞庵的具体发展历程，《普陀洛迦新志》有明确记载：

> 观音洞庵 明万历间，一僧始结茅于此。清雍正间，法泽始创建。道光间，海南修之。光绪间，裔孙化响重建大殿。宣统一年，僧开林添建客堂及楼房，渐臻完美云。（旧志采访）[1]

依据此文献表述，观音洞庵的主体建筑由高僧法泽于清代雍正年间主持修建，并正式命名为“观音洞庵”，该命名进一步强化了庵宇与所在洞穴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且此后在清道光、光绪及宣统各朝，经僧人持续增建，庵宇建筑规模逐步拓展。

然而，上述“观音洞庵始建于雍正年间”的记载是否准确？仍需结合清代其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证。其中，《普陀山大辞典》记载：

> 扣平，名超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出家于普陀禅寺。欲觅地礼经，普陀山长老道恒命其居观音洞庵，庵位于梅岑峰西南崖间，山道崎岖，扣平修砌石径，扩建殿宇。[2]

关于扣平法师的生平记述为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扣平法师在康熙年间想要找寻适宜之地礼经修行时，普陀山道恒长老指令其居住于观音洞庵，这一史实直接表明，在扣平法师生前，观音洞庵已然存在。

此外，许琰所著《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亦提供了关键佐证信息。该文献虽未直接明确观音洞庵的始创时间，但可通过其中记载的人物生平时间推导出相关线索，其文曰：

> 观音洞庵：僧超直字扣平，为法雨寺监院，往金陵募建殿木。还，病卒于途。其徒润石赍其骨归建塔庵侧，与素白同居。素白，扣平同参兄弟也。别庵和尚每至其塔，辄凄怆动哀。赋诗志感。至今寺多其功，岁时扫塔致祭焉。[1]

据这段记载可知，扣平法师在赴金陵募捐殿宇建材的返程途中圆寂，其弟子润石法师为缅怀师父，将其遗骨护送回普陀山，并于观音洞庵旁营建墓塔。这一史实清晰表明，润石法师建塔行为的前提是观音洞庵已然存在，二者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先有庵，后建塔”的明确逻辑关系。

从人物生平时间维度进一步考证，清代别庵性统禅师生卒年份分别为1662年与1717年，其一生活动轨迹均处于康熙朝时期。文献明确记载，别庵性统禅师每次到访扣平法师墓塔时，均会产生凄怆哀痛之情，这一细节可间接佐证：扣平法师墓塔在别庵性统禅师在世期间（即1717年之前）已建成。结合前文“先有庵，后建塔”的逻辑，可推导出观音洞庵的建成时间必然早于扣平法师墓塔，进而早于1717年，这与《普陀洛迦新志》所记载的“清雍正间”始创时间形成明显矛盾。

与此同时，通过对明代时期普陀山系列山志的系统性检索发现，所有明代山志文献中均未出现关于观音洞庵的任何记载。综合上述双重考证结果——既不明确明代始创的可能性，又证实其建成时间早于雍正朝，可进一步推断：观音洞庵的主体营建，最迟应发生于清代康熙年间，其形态演变路径为从“明万历间，一僧始结茅于此”[1]的简易修行茅蓬逐步扩建为佛教庵宇在功能与形态上的转变。

综上，经多文献交叉验证与时间线逻辑推演，现有研究可明确判定：《普陀洛迦新志》中关于观音洞庵“始建于雍正年间”[1]的记载存在史实误差。需补充说明的是，关于观音洞庵创始人的具体身份考证，因受本文研究范围与篇幅所限，且该问题与本研究核心议题关联度较低，故暂不纳入本次探讨范畴，留待后续研究予以深入挖掘与考证。通过对比观音洞与观音洞庵的文献

记录及建设时间不难发现，观音洞作为自然石窟景观，其开发进程与文献记载均早于观音洞庵的建设，二者形成“先洞后庵”的清晰历史发展序列，成为普陀山宗教文化景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观音洞相关历史文献考析

在普陀山现存石窟中，从景观代表性与文化辐射力来看，观音洞、潮音洞、梵音洞与善财洞共同构成普陀山现存石窟景观的核心代表体系，其中观音洞以洞内空间规模宏大为显著特征，这一特质在《普陀洛迦新志》中亦有明确记载：“观音洞：在梅岑后。一说，石室之大者，当推是洞。香火亦称盛。”[3]这段记载既指出观音洞的地理区位（梅岑后），又直接强调其在普陀山石窟中“石室之大者”的空间地位，同时提及“香火亦称盛”的宗教活动盛况，进一步印证了观音洞在普陀山石窟景观体系中的地位。需注意的是，普陀山洞穴景观并非仅有上述四处，还包括法华洞、朝阳洞、摩尼洞、白云洞、金刚洞、宝塔洞、莲台洞、洛迦洞、平天洞、古佛洞、弥勒洞、灵佑洞、小山洞等[3]。

关于“观音洞”这一名称的文献记载，目前可追溯至宋代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这是现存最早提及普陀山该名称的历史文献。在《普陀洛迦新志》中引录了《墨庄漫录》关于观音洞的记载：“司户王璟往宝陀山观音洞祷雨。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祷，愿有所睹。须臾，见栏楯数尺，皆碧玉，有刻镂之文，如世间所造宫殿者。已而，复现纹如珊瑚者，亦数尺。久之，于深远处见菩萨像，白衣、璎珞，了了可数。（《墨庄漫录》）”[3]这段文字记录了宋代司户王璟受州郡委托，前往“宝陀山”（即后世普陀山）观音洞祷雨时所见的宗教感应现象。

为进一步厘清文献中观音洞的空间特征，需结合《墨庄漫录》原文展开分析，其载：

> 予在四明时，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璟粹昭，郡檄往昌国县宝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洞中水声如考，数百面鼓鼙，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3]

从这段记述可知，王璟所前往的观音洞位于昌国县宝陀山（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但文中“洞中水声如考，数百面鼓鼙，语不相闻”的环境描写，揭示该洞穴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紧邻水域且水声浩大，声音强度足以掩盖人际对话，由此可推断《墨庄漫录》所记载的“观音洞”应处于近水区域。

然而，当前普陀山现存的观音洞位于普陀山西麓半山腰，与《墨庄漫录》中“近水、水声浩大”的空间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基于这一矛盾点可初步判断，宋代文献记载中王璟祷雨所至的“观音洞”，并非现今普陀山西天景区内的观音洞。为验证这一判断，需围绕“洞中水声浩大”这一核心线索，在普陀山现存石窟景观中，找寻兼具“水声显著”与“历史祈雨功能”的灵验洞穴，在《普陀山大辞典》中记载的潮音洞“洞脚插海。……海潮撞击，声若惊雷，来泻飞瀑，回溅明珠，惊心动魄”[2]的区位特点，与《墨庄漫录》中“水声如考，数百面鼓鼙”的描述完全吻合。综合空间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可最终确定，宋代《墨庄漫录》中所记述的王璟祷雨之“观音洞”，实际应为普陀山现存的潮音洞，而非本文研究聚焦的普陀山西麓半山腰处的观音洞。

观音洞的历史文献记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所承载的景观内涵存在差异。从现存文献来看，明代万历时期的普陀山山志中，观音洞尚未与普陀山其他石窟景观并列记载，直至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文学家张岱在游历普陀山之后，撰写了游记《海志》。在这篇著作中，张岱首次将观音洞与旁侧的鹦哥石作为关联景观共同提及：“观音洞有鹦哥石，飞动如生”[4]，这一描述将观音洞与旁边的鹦哥石联系起来，作为相关联的景观进行了阐述，标志着观音洞作为独立景观单元开始进入文献记录视野，为后人了解观音洞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进入清代后，关于观音洞的文献记载明显增多，涵盖游记与诗文等多种体裁，间接印证了这一时期观音洞已具备较高的知名度。例如，清初贡生万言所作《磐陀石》诗中，以“观音洞里石玲珑，观音洞外石相负。层层枕压巨细横，大石如冈亘其首”[3]两联，先描述观音洞的石景特征。顺治十一年（1654）春二月，陆宝在其游记中亦对观音洞描写：“洞在四山中，嵌空刻露，有石骨倒悬拄地，四周可环而走。”[3]指出观音洞的空间形态有细致刻画。清代祝德风的《观音洞》诗则以“欣从洞口望慈云，路绕梅岑已夕曛。鹦鹉垂头如听法，岩花水草互缤纷”的诗句，进一步呈现了观音洞周边的景观意境与宗教氛围。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清代前期文献对观音洞的记载均聚焦于石洞本体，尚未出现关于“观音洞庵”的相关描述，表明此阶段观音洞的景观形态仍以自然石窟为核心。

3 观音洞窟圣地属性及石刻佛像

观音洞窟是普陀山圣地景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圣地”通常指具有神圣性的特定空间地点，且该神圣性往往与特定宗教信仰体系存在直接关联。鞠熙（2013）在系统梳理了法国人类学领域关于空间神圣性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出圣地神圣性构成的三个核心层面，即“集体仪式、自然景观与历史过程”[5]。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为解析观音洞的景观特征、阐释其空间营造逻辑提供了合理且有效的理论支撑，更有助于深入揭示景观创制活动，在完善普陀山圣地空间叙事、实现空间叙事历史接续过程中所承载的重要意义。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曾对普陀山的独特景观特质作出论断，他指出，普陀山的自然环境带来与众不同的神秘感，使之不同于泰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地，而是在这一与世隔绝的岛屿上，寺院建筑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6]。从圣地类型学视角来看，除广泛认知的圣山外，洞穴亦是重要的圣地形态之一，可理解为“空间内的空间”[7]，并可延伸为“场所精神（genius loci）”[8]，观音洞洞穴亦可被这样解读：可作为圣山的景观要素，也可单独构成圣地，并承载场所精神。

从历史发展时序来看，观音洞作为自然形成的石窟景观，其出现时间远早于围绕其修建的庵院建筑，二者呈现“先洞后庵”的发展脉络。但随着庵院建设逐步成熟并形成完整格局，观音洞的空间属性发生转变，从独立的自然景观单元演变为庵院内景点与宗教功能空间，使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观音洞与其所属寺院的布局形态受到普陀山西麓山腰地形条件的直接制约，形成独特的院落式结构。寺院主要殿堂朝向西北方向，其前部空间与观音洞、斋堂及寮房共同围合，形成寺院中心合院区域，构成寺院功能运转的核心载体。在空间轴线组织层面，圆通宝殿与斋堂的连线构成寺院的主轴线，主导整体空间秩序；而观音洞与寮房的布局则形成次要轴线，与主轴线相互呼应，共同维系合院空间的视觉均衡与功能协调（详见图 1）。其中，观音洞自身朝向西南，与主轴线形成一定角度，在遵循场地地形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又通过轴线关系的巧妙设计，使观音洞自然融入寺院整体空间体系之中，这种“不对称性视为蕴含着节奏感的均衡，建筑适应地形并与场地成为整体”[9]的理念，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工建筑的有机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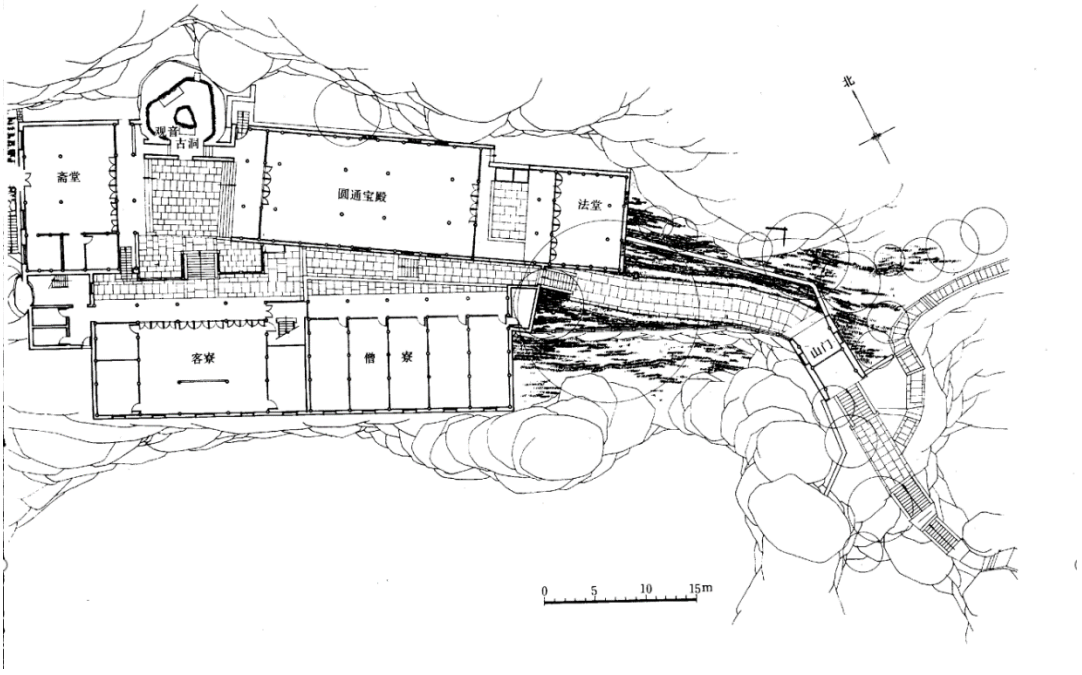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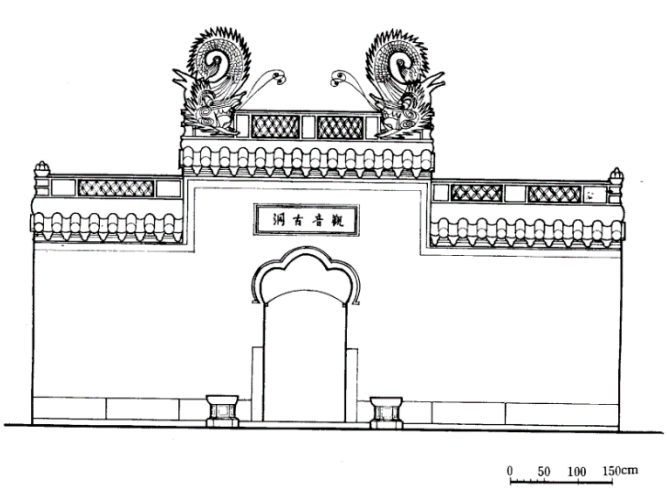


图 1　普陀山观音洞平面图[10]

从形态特征来看，观音洞的外部呈现明显的人工改造痕迹，其立面表现为寺院围墙上的一处开口，且该立面与寺院内部庭院直接相对，围墙本身即构成观音洞立面的主体部分（详见图 2）。若仅从立面要素分析，墙面、压顶、匾额及门洞等构件均属于典型建筑语汇，使得自然石洞在视觉上呈现出类似寺院建筑单体的空间属性，弱化了其原始自然形态特征。在观音洞洞口正前方，矗立着一整块上下贯通的巨大石柱，该石柱可供人环绕行走，由此形成特定的礼拜礼仪流程：礼拜者需从石柱左侧进入，沿顺时针方向（右绕）行走一周后自

右侧离开。这一礼仪形式源于早期佛教传统——在佛教文化中，“右绕佛陀”是表达礼敬的仪式，后逐渐延伸至绕塔、绕经及周匝式佛教空间的礼拜行为中，成为佛教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版一六〇 观音洞庵洞口立面
Drg. 160 Elevation of the entrance of the Cave in the Guanyin-cave Monastery

图 2 观音洞洞口立面[10]

在细节装饰与宗教功能配置上，石柱面向洞口的一侧雕刻有观音造像，造像旁设置香案，供礼拜者焚香祈福；观音洞内部北端的石壁上同样镌刻有宗教圣像，且洞内壁面未做过多修饰，完整保留了山石原生肌理，呈现出古朴苍劲的视觉风貌，与外部人工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自然肌理与人工造像结合”的形态特征，既延续了观音洞作为自然石窟的本底属性，又通过宗教元素的植入强化了其宗教功能，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宗教的深度融合。

从具体案例来看，普陀山观音洞作为自然形成的石窟，其空间形态与宗教功能呈现独特融合特征。该洞深度约 7 米，整体呈环状结构，“洞内幽幽冥冥，寒侵肌骨，清泉如珠，雾霭袅袅。”[10]洞壁间凿刻有多尊佛菩萨造像，进一步强化了宗教氛围。在空间体验上，观音洞的朝礼路径具有明确仪式性——礼拜者需从单一入口进入，绕行一周后自另一出口离开，无回头路径可言。这一体验可结合学界相关理论解读：经狭窄洞口进入并礼拜观音像的过程，象征着罪孽清除与转世重生。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88）进一步提出远东地区存在“子宫——洞穴”概念，指出洞穴形态与子宫的相似性使其承载双重意义：既包含佛教语境中的灭罪转生，也涵盖民间信仰中的护佑顺产，而洞口狭窄通道则被视为连接现实世界与想象神圣世界的媒介。

通常而言，这类洞穴内部转折处狭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且此处恰为洞内最昏暗区域，使得朝礼者的行进过程伴随“明—暗—明”的光线变化，这种感官体验被赋予精神重生的象征意义。不过，受香客流量影响，并出于游客安全考虑，观音洞内部均加装了灯管，人工照明虽提升了空间亮度，却干扰了洞穴原有的幽暗氛围，导致未知感与神秘感弱化，进而降低了朝礼者的神圣体验。

在人工照明对洞穴整体朝礼氛围产生影响的同时，观音洞内部的宗教文化表达核心，更多依托于石壁之上的造像得以呈现。这些直接凿刻于洞体岩壁的造像，不仅构成了洞穴空间内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宗教符号，更成为承载佛教教义与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

石窟作为一种特定的宗教空间形态，其开凿多选择天然山洞或山体悬崖峭壁之处，内部通过雕刻佛像、描绘佛教故事等宗教元素，构建起兼具实用性与象征性的信仰场域。从功能属性来看，石窟最初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僧侣修行与信众朝礼需求，为宗教活动提供专属空间；与此同时，其内部的造像与纹饰又承担着文字记录与符号象征的双重功能，既是对佛教文化的具象化呈现，也是宗教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

具体到观音洞内部，在洞穴后部的洞壁上，依循石壁原生形态刻凿而成的一组三佛造像（详见图 3），是该洞穴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这组造像的组合类型为横三世佛，在佛教造像体系中亦常被称作“三尊佛”或“三方佛”，其造像构成分别对应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与药师佛，分别代表佛教中不同的佛国世界。从整体造型范式来看，这三尊造像均呈现出神态安然、体态舒展的艺术特征，且统一采用跏趺坐式，双手结禅定印；

造像头部均饰有螺髻，身后雕刻有头光以凸显神圣性，胸前则共同带有卍字标识以象征吉祥海云相，这些共性元素构建起造像的基本形态框架，且完全契合汉地佛教造像的经典规范，体现出鲜明的宗教艺术特色。



图 3　观音洞洞穴后壁三佛石刻造像（笔者自摄）



图 4　观音洞洞穴内石柱上石刻造像（笔者自摄）

在造像布局与体量关系的设计上，处于中间位置的释迦牟尼佛，其高度略高于两侧的阿弥陀佛与药师佛。这种非均衡的空间体量设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通过刻意营造的体量差异，强化了释迦牟尼佛在三佛组合中的核心地位。

佛像的雕琢线条刻画如行云流水，兼具流畅性与细腻感；从造像的头部和身躯形态来看，整体呈现粗壮、健硕的态势，其造像风格具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整体造型并非追求抽象的神性表达，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中年男性为原型构建身体比例，呈现出略显健壮的体态特征，使佛像形象更贴近人间视觉经验。在头光设计上，三佛头光均采用正圆形造型，这一设计与佛教规制直接相关——正圆形“头光”在佛教文化中象征德行圆满，寓意智慧之光普照一切众生，是佛教造像中表达神圣性的典型符号。在面部塑造上，三佛面相均呈平正方圆之态，广颐、丰颊、圆颌的面部轮廓和谐协调，既展现出妙相庄严的神圣感，又通过祥和的神情传递出亲和的气质；具体细节上，眉弓呈弧形弯曲，眼睑修长，目珠内敛且微微下视，塑造出秀丽的眼部形态，传递出亲切自然的意态；鼻梁窄平且略带弧度，鼻翼宽度适中；嘴唇呈圆形内抿状，嘴角微微内凹，兼具庄严感与亲和感，实现宗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在服饰细节方面，三尊佛的衣物采用敷搭双肩下垂式的设计并未突出华贵的装饰感，而是以简约的风格贴合整体造像的肃穆基调，体现向注重人体刻画过渡的趋势，裙装为莲花状厥修罗，进一步强化了造像的庄严气质。需要强调的是，依据佛教造像的既定规制，佛像不得佩戴璎珞，璎珞与华鬘等华贵装饰仅适用于菩萨级人物[11]，而观音洞三佛造像严格遵循了这一规制，进一步印证了该造像群对佛教传统的忠实传承。

观音洞内部靠近洞口的中央石柱区域，留存有一组西方三圣石窟造像及两尊护法造像。受自然年代侵蚀与香烛烟熏火烤等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该组造像的整体形态已出现漫漶模糊，细节辨识度大幅降低；同时，当前该造像群前方已新增一尊石质观音像，空间布局与视觉焦点均发生一定变化。基于上述造像保存现状与空间环境的实际情况，下文将不再对这组石柱石刻造像展开逐一详述。

但需着重强调的是，该组造像的磨损状态并非个例，其本质上反映出观音洞部分文物当前面临的共性保存困境。其中，自然年代侵蚀和烟熏火烤等人为活动带来的持续性损害，对造像材质与风貌的破坏较为突出，因此需优先关注并针对性防控此类影响因素，以遏制文物风貌的进一步流失，为后续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佛像作为人类将内心理想神性予以具象化呈现的艺术形态，将佛菩萨所蕴含的庄严特质与威仪气象直观传递给观者，使人们在面对佛像时，能够借助这一具体的艺术媒介，安放并寄托自身的内心美好期许。佛教造像也是信众抒发宗教情感、祈求心愿达成的重要载体，更成为神圣菩萨与凡夫众生之间实现“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关键桥梁。

于君方（1998）在相关研究中率先提出，灵验记是推动观音信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媒介，该观点为解析观音信仰的实践逻辑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12]。何蓉

（2015）则进一步指出：“宗教场所的兴建本身是宗教神圣性与社会发生关联的关键点”[13]，这一论述对观音洞信仰空间的属性与功能分析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从景观属性演变来看，特定命名是景观脱离普通自然风景范畴、融入圣地叙事体系的关键契机，观音洞的发展历程便是典型例证：即脱离普通自然风景的范畴，融入圣地景观的叙事体系，进而承载信仰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成为具备宗教象征意义的空间载体。

从民众实践维度审视，祈福行为并非单一的个体宗教表达，而是兼具社会属性的活动。其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向公众传递积极价值信号，在稳定民心、引导社会风气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实际作用；而民众参与此类行为的核心心理驱动，源于对“通过虔诚宗教实践可获得神灵庇佑、达成自身愿望”的信念认同。这种信仰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助景观空间中承载的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构建起特殊连接，让观者在接触景观的过程中，获得在现实场景与信仰想象、当下时空与历史语境间自如切换的感知体验。

从当代实践案例可直观印证这一认知与现象：普陀山观音洞的洞壁上悬挂着大量当代印制的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均对应一则“信众认为得到菩萨感应、心愿实现”的信仰体验叙事。这些具象化的实物证据与鲜活的信仰案例相互佐证，清晰地表明观音洞的求愿灵验现象在当代社会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持续维系着圣地与信众之间的精神联结。

4 结语

观音洞通过平衡人造物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与场地空间的关系，不仅实现了视觉、功能与体验层面的需求，更完成了景观空间的意义建构。佛教造像承载宗教象征意义，赋予其圣地属性，信众的祈福等实践则维系了其信仰活力，共同推动观音洞成为兼具神圣性与社会联结性的文化空间。

当前，社会“新陈代谢”加速，观音洞圣地叙事结构虽基本维系，但需持续关注其景观动态。目前观音洞存在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石像因长期受自然侵蚀及香烛油烟熏烤，细节磨损明显，未来状况引人忧虑。正如能进法师在《河北佛教遗迹印象记》中唤起社会对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呼吁[14]，为观音洞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亦是本研究对其未来发展的关切。

参考文献

[1] 武锋. 普陀山历代山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903, 1573.

[2] 王连胜. 普陀山大辞典[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41, 283.

[3] 王亨彦. 普陀洛迦新志[M]//杜洁祥. 中国佛寺史志汇刊: 第一辑第 10 册. 台北: 明文书局, 1980: 96, 111, 137, 178, 557.

[4] 新浪博客. 《海志》张岱[EB/OL]. (2019-01-08)[2025-09-13]. https://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48a53ac60102ybrc.html.

[5] 鞠熙. 圣地之“圣”何来?——法国人类学研究空间神圣性的几个方向[J]. 世界宗教研究, 2013(5): 184.

[6] 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上册[M]. 李岩, 王彦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6: 118.

[7] 诺伯舒茨. 西方建筑的意义[M]. 李路珂, 欧阳恬之,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16.

[8] 诺伯舒茨. 场所精神: 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9] 勒•柯布西耶. 走向新建筑[M]. 吴景祥,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

[10] 赵振武, 丁承朴. 普陀山古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87, 281, 284.

[11] 佛教常识. 璎珞与华鬘[EB/OL]. [2025-09-13]. http://www.zhlzw.com/ls/wh097/34.html.

[12] YU C. Miracle tale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Kuan-yin[J].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1998(11): 409-453.

[13] 何蓉. 营造神圣之地: 作为宗教与社会关联的核心的宗教场所[J]. 宗教人类学, 2015(6): 61.

[14] 能进. 河北佛教遗迹印象记[J]. 法音, 1998(11): 24.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